

明清时期邹鲁地区书院发展特质及成因探析

——以方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郭云鹏

提 要：通过梳理邹鲁地区方志等资料，发现其地书院在明清时期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发展特征：“重圣迹”的分布格局、“重祭祀”的功能重心、“偏官属”的组织形式、“中正保守”的教化理念。究其原因，在于此地作为孔孟故里，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人文纯粹、民风重礼的文化环境。同时，四氏学、奎文阁等文教设施的兴盛也挤压了书院教育功能的发展空间。对明清邹鲁地区书院进行研究，有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书院 明清 邹鲁 发展特质 地方志

“邹鲁”是山东邹城、曲阜二县的合称，因先秦时期此地有邹、鲁二国而得名。又孔孟等儒家先圣发迹于此，“邹鲁”逐渐成为文化昌盛之地的代名词。《庄子·天下篇》云：“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①《史记·货殖列传》亦云：“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颀颀。”^②《邹县志》则云：“孔孟为天壤立极之人，而邹鲁为川岳钟灵之地。”^③故而潮州、福州、泉州、徽州、金华等地先后有别称如“海滨邹鲁”“东南邹鲁”“江南邹鲁”一类。邹鲁地区作为儒学发源地，其文教发展状况在古代被认为是封建国家文化政策的晴雨表，而其地书院在明清时期却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发展特征。至于明清时期邹鲁地区的书院呈现出哪些发展特质，这些特质背后又有哪些成因，都需从其地方志等资料中去探究、分析。

一 明清邹鲁地区书院概况及载记爬梳

书院是古代文化史和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以区域划分方式进行书院研究是其常用办法之一，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注重检阅和利用地方志等材料。明清时期的多数地方志都会在学校志（或教育卷）部分录述本地书院建置情况，同时在职官卷可查本地官办书院学录品秩及更替、贡举卷可查本地书院学员科举入仕情况、方域志可查本地书院古迹存续情况、艺文志可查本地书院所留碑刻内容及相关文献，部分书院的学田情况还见载于土地赋役分卷。综合利用地方志中的这些材料，再结合书院志记、书院碑刻、有关书院的人物传记等材料，基本可以构建起一套区域书院研究的资料系统。以往的区域书院史研究大多都注意到了这一史料范畴，但地方志和碑刻的检阅难度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相关研究的质量，张冠李戴、以偏概全、时地人物错讹的信息和结论不乏涌出。所以，在研究明清时期邹鲁地区书院具体情况之前，有必要对相关方志材料的情况进行仔细爬梳。

^①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983页。

^②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3266页。

^③ 娄一均：康熙《邹县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72册，第323页。

首先,查“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①,可知《曲阜县志》《邹县县志》以及《兖州府志》《山东通志》的存续情况,其中常见者如后。《曲阜县志》:清康熙十二年(1673)孔胤淳版、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潘相版、民国23年(1934)李经野续修版。《邹县县志》:清康熙五十五年娄一均版、清光绪十八年(1892)吴若灏续修版。《兖州府志》: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于慎行版、清乾隆三十五年觉罗普尔泰版。《山东通志》:明嘉靖十二年(1533)陆钺版、清康熙十七年赵祥星版、清雍正七年(1729)岳浚版、清宣统三年(1911)杨士襄版。其次,《阙里志》《阙里文献考》《三迁志》《重纂三迁志》《孔颜孟三氏志》《圣门志》《孟志》《东野志》《陋巷志》《幸鲁盛典》等相关泛方志材料为邹鲁地区的书院研究提供了大量史料^②,新编《曲阜教育志》《邹县教育志》也对古代书院情况进行了简要说明。此外,“孔府档案”和“孟府档案”中保留了一批有关书院的文书档案,为研究书院具体情况提供了直接史料。

前辈学者根据相关材料曾对山东省内书院情况做过一些统计和研究,这些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定学术参考。^③但直接探析邹鲁地区书院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多,除孙业旺和孟继新合作主编的《济宁书院与四氏学》一书外,仅见骆承烈、江堤、石玲等人发表的几篇论文。^④通览这些论著,可以发现邹鲁地区书院研究在资料视域、整体认知和文化分析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水平,如骆承烈、孟继新等利用孔府档案对书院情况进行梳理;石玲对洙泗、尼山二书院发展的独特之处进行了总结。但相关研究成果在历史剖析深度、辩证认知态度上存在欠缺,主要表现为缺乏对书院发展特质及成因的深层剖析和系统论证、对书院发展状况中存在的问题不能进行有效揭示,也未能将邹鲁地区书院当作一个整体进而结合区域文化特征进行论述,故相关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综合上述方志等资料,特制“明清时期邹鲁地区书院建置情况表”,以便后文论述。

明清时期邹鲁地区书院建置情况表

书院名称	位置	始建年代	创建者
尼山书院	曲阜尼山	宋庆历三年(1043)	文宣公孔宗愿
春秋书院	曲阜息陬	约在宋朝年间	孔氏族人及乡民

① 参见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255—295页。

② 这些材料多为家族或个人私修,但其体例、内容和官修地方志大同小异,保留了很多有价值的地方史料。

③ 山东省内书院方面的相关研究论著,如赵承福《山东教育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十二章“宋—清时期的山东书院”、李伟《山东书院史话》(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白新良《明清山东书院述论》(《齐鲁学刊》1992年第4期)、张良才《山东古代书院的特点》(《中国书院》第2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张熙惟《宋元时期山东书院教育的创立与发展》(《齐鲁文化研究》第2辑,齐鲁书社,2003年)、马学强和赵树廷《清代山东书院的发展研究》(《历史档案》2005年第4期)、孔帅《宋元时期山东书院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卢兴民《清代山东书院研究三题》(南京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对山东古代书院进行统计的成果,如张洪生《宋、元、明、清山东书院一览表》(《山东教育史志资料》1987年第4期)、安作璋和王志民主编《齐鲁文化通史》(中华书局,2004年)以及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④ 参见骆承烈、梁方建:《孔府书院及其特点》,《南昌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江堤:《孔子与洙泗书院》,《文物天地》2002年第9期;石玲:《曲阜洙泗、尼山书院的文化内涵》,王志民主编:《齐鲁文化研究》第5辑,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92—195页。

(续表)

书院名称	位置	始建年代	创建者
洙泗书院	曲阜孔林东	元至元四年(1338)	世职知县孔克钦
石门书院	曲阜董家庄	乾隆四十年(1775)	孔氏族人及乡民
两学书院	曲阜城里	乾隆四十三年	县令张万贯
昌平书院	曲阜城西	道光十四年(1834)	县令冯云鹤
子思书院	邹县东南	元贞元年(1295)	县尹司居敬
近圣书院	邹县城里	乾隆年间	知县李时乘
三迁书院	邹县亚圣府西	道光年间	世袭博士孟广均

由上表可知,明清时期邹鲁地区见载于史籍的书院总计9座,其中曲阜6座、邹县3座(本文以尼山划归曲阜计);宋元时期成立的4座、明清时期成立的5座。其中子思书院原名中庸精舍,后又名中庸书院,本文以清光绪十八年《邹县续志》存名为准。由于邹鲁地区明清时期所存书院有的成立于宋元时期,有的在明清时期也存在兴废情况,故下文所论发展特质及成因乃以明清时期整体情况而言,并不否认部分特质已于宋元时期开始显现。

二 明清邹鲁地区书院发展特质探究

明清时期邹鲁地区书院从分布格局到功能重心,从组织形式到教化理念,均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发展特质,带有明显的邹鲁地方特色。

(一)“重圣迹”的分布格局。凡教育无不与学者相关,书院作为教育机构,其建置多关乎先贤,如“表彰学人、学派而设者,则东林之于杨时,关中之于张载,蒿庵之于张尔岐,船山之于王夫之”^①。在邹鲁地区则无贤者胜于圣人之理,故书院之设多关乎孔孟等儒家先圣。

尼山书院,又名诞育书院,依靠孔子诞生地尼山而设。《史记·孔子世家》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②尼丘便指尼山,后周太祖显德年间鲁守赵侯在尼山建庙,“宋庆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孙袭文宣公知兖州仙源县宗愿作新宫,有庙,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讲堂,有学舍,有祭田。”^③“至元二年,左丞王公懋德议设尼山书院,以璠为山长。”^④今尼山所存夫子洞诉说着孔子诞生的故事,尼山山神也因此被宋仁宗特封为“毓圣侯”。春秋书院,位于曲阜息陬,“昔孔子欲西见赵简子,至河乃还息乎陬乡,作息陬操因以为名。相传此地为孔子作春秋处。”^⑤此地原存春秋台,任昉《述异记》云,“曲阜县南十里,有孔子春秋台。”^⑥后人借此认为孔子在此处作《春秋》,今其地仍存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孔子作春秋

① 邓之诚:《清季书院述略》,卞孝萱、徐雁编:《书院与文化遗产》,中华书局,2009年,第12页。

② 《史记》卷47《孔子世家》,第1905页。

③ 彭璠:《尼山书院记》,陈镐:《阙里志》卷9《历代碑记》,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年,第635页。

④ 陈绎曾:《尼山书院碑铭》,陈镐:《阙里志》卷9《历代碑记》,第631页。

⑤ 李经野等纂修:民国《曲阜县志》卷4《政教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9号,第379页。

⑥ 任昉:《述异记》,中华书局,1991年,第22页。

处”碑刻一通。洙泗书院，因泗水经其北，洙水带其南而得名。“昔孔子自卫反鲁，设教于洙泗之间，此其讲堂也。”^①相传孔子在此删《诗》、订《书》、赞《易》、修《春秋》，可谓是“备王者礼乐，惟祖庭为盛。洙泗遗址，斯文所基”^②。东汉时，“诸弟子房舍并瓮犹存。建武五年，光武帝击破董宪于昌虑，还过鲁，坐孔子讲堂，顾指子路室谓左右曰：‘此吾太仆之室也。’”^③洙泗书院前身即为先圣讲堂，又称“仲尼燕居堂”，实为儒家学派的黉门宗地。子思书院因子思祠而建，旧名“子思讲堂”。“相传思孟授受于此”^④，至元朝，“邑人犹曰，此古宅也，此讲堂也。洞洞属属，如将见之。”^⑤书院庙殿曰“诚明”，后堂曰“率性”，斋曰“慎独”，今邹县孟庙内仍存道光十二年（1832）所立“子思子作中庸处”和“孟母断机处”碑刻两通，述说着明清时人对思孟二圣的追念。

此外，石门书院因接近以“先圣学易处”和“子路宿于石门”而闻名的石门山得名；两学书院因曲阜有“四氏学”和“县学”而得名；昌平书院因“居是邑者皆昌平乡人”得名，且有“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之典故。近圣书院取近于圣域之义，三迁书院取“孟母三迁”的典故，可以看出邹鲁地区的书院在选址上有意贴合圣迹，形成了重圣迹的分布格局。以圣人为名、以圣迹为踪而设书院是山东特色，有的据于典籍，有的因于传说，如汶上圣泽书院、滋阳颜子书院、微山仲子书院、沂水闵子书院、嘉祥获麟书院等。书院选址以系于圣人、圣迹为荣，以至于民国《曲阜县志》在“书院”目下云：“有地地址不在本县而同列入此志者，重圣迹也。”^⑥

（二）“重祭祀”的功能重心。通览天下书院，其功能大概可归纳为五项，教授生徒以储人才、祭祀先圣以崇儒学、藏书刊版以存斯文、辩论讲会以正时弊、教化乡里以睦村邻。尽管并非每个书院都完全具备这五项功能，但各有取舍侧重，故有“考课式书院”“祭祀型书院”之谓。邹鲁地区书院因圣迹而设，自然更加注重对先圣之祭祀。“曲阜书院之设，名目繁多，其关于祭祀者如尼山书院、洙泗书院、春秋书院、石门书院、圣泽书院、中庸书院……至于教授生徒、造就人才，专为教育而设之书院，则有两学书院、昌平书院。”^⑦可见，前表所录9座书院中有5座被定性为祭祀型书院。

由于古代学校需按时举行释奠、释菜、释币等礼，故书院多建有祭祀儒家先圣的设施并以“庙学合一”形式呈现，但其存在3种不同性质的情况。一是因庙设学，即先建有文庙（孔庙），后依庙而兴办书院，如春秋书院；二是因学设庙，即书院创设的最初和主要目的是教学，而书院内部通常设置有祭祀儒家先圣的设施，如昌平书院；三是虽名书院实为文庙，几乎没有教学功能，如石门书院。判断一所书院的功能重心，主要通过祭祀活动与教学活动的比较衡量和对书院建筑设置的功能考察来进行。尼山书院因尼山孔庙而设，“作大成殿、大成门、神厨，作明伦

① 乾隆《兖州府志》卷9《阙里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71册，第184页。

② 宋元隆：《创建洙泗书院之记》，杨朝明主编：《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第4辑，齐鲁书社，2018年，第117页。

③ 孔继汾著，周海生点校：《阙里文献考》卷13《林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76页。

④ 吕元善：《三迁志》卷4上，明天启七年（1627）刻本，第33页。

⑤ 《孔颜孟三氏志》卷6《亚圣孟氏志事类》，“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传记类，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4册，第310页。

⑥ 李经野等纂修：民国《曲阜县志》卷4《政教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9号，第377页。

⑦ 李经野等纂修：民国《曲阜县志》卷4《政教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9号，第377页。

堂、东斋、西斋、东塾、西塾，作育圣侯庙、作观川亭”^①，早期曾教授学生，“置弟子员，以尼民之子弟俊秀者充之，皆复其身役”^②，至明清时期教学活动几于消弭。洙泗书院，“有重门，中为正殿，殿内祀至圣孔子，四配、十哲分侍左右，两庑列祀诸贤”^③，无教学活动记录。其实，春秋书院、石门书院、子思书院都类似于此，或稍授生徒，或不事教学，偏重于祭祀。石门书院本为儒释道三教堂，后将佛老迁出，特建大殿奉祀至圣先师孔子和四配。故乾隆《兖州府志》将尼山书院、洙泗书院列入祀典一类，而《阙里文献考》则在“学校”目下云：“今尼山、洙泗、圣泽、中庸四书院止奉禋祀，而不设生徒，故兹考不叙，别入《林庙考》中。”^④又“书院者，本为春秋讲学而设也。今庙祀虽肃，而弦颂之声无闻，戾厥旨矣”^⑤。可见邹鲁地区部分书院在明清时期逐渐丧失了教学功能，而专行祭祀之事。

昌平书院系因教学而设，而“先师圣像肃祀其中，并祀文昌帝君于其东堂”^⑥，十分注重祭祀。三迁书院设于孟府，以书院为名而行家学之实，祭祀先师即为尊奉先祖，应是礼仪具备不敢差池。不教学的书院也不曾藏书，邹鲁地区书院也未曾有闻辩论讲会之盛事，整体上呈现出重祭祀的功能重心。同时，邹鲁地区祭祀型书院大多常设朝廷敕封的奉祀官，偏重祭祀的功能属性引发出偏重官属的组织形式。

(三)“偏官属”的组织形式。一般来讲，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系统之外的一种教育机构，“它不依靠朝廷的正式诏令而建立，其主持者、管理者都没纳入朝廷的官学教职之中”^⑦。普通书院多由乡贤创建，虽然可能受助于地方官员和士绅，但在创办力量和教员设置上仍属民办。邹鲁地区的书院有其特殊性，其组织形式整体上更偏重于官属。

首先，从创办力量和管理运行看，邹鲁地区书院大多由圣裔所创，运行亦多由圣府掌控。尼山、春秋、洙泗、石门4书院由孔子后裔直接参与创建，创建后列归圣府制下，而圣府本身即具备官衙性质，四氏圣裔亦各有官衔，所以连带书院也侧重于官衙性质。尼山书院和洙泗书院的学录以孔氏保任，春秋书院和石门书院每年的春秋祭祀均由圣公府委派奉祀官，昌平书院的活动也不乏孔府和县衙身影。子思书院初为外姓知县创立，但到明清时期划归圣府管辖。三迁书院创办者本身就是膺受朝廷世袭官衔的孟子后裔，作为孟氏一族家学，运行上时刻由具有官衙性质的孟府节制。

其次，从书院管理者的身份属性看，邹鲁地区书院的山长、学录多有官阶品秩。尼山书院初创时，“用林庙管勾简实理言，请复尼山祠庙，置官师奉祀。”^⑧“官师”一称屡见于邹鲁地区书院的相关记载，以彰显其座师的官方身份。尼山书院和春秋书院于明正德二年（1507），因“衍圣公闻韶奏准，改山长职衔为国子监学录，以孔氏保任”^⑨。“尼山书院学录，明秩从九品，乾

① 陈绎曾：《尼山书院碑铭》，陈镐：《阙里志》卷9《历代碑记》，第632页。

② 彭璠：《尼山书院记》，陈镐：《阙里志》卷9《历代碑记》，第636页。

③ 乾隆《兖州府志》卷9《阙里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71册，第184页。

④ 孔继汾著，周海生点校：《阙里文献考》卷27《学校》，第215页。

⑤ 孔继汾著，周海生点校：《阙里文献考》卷13《林庙》，第77页。

⑥ 李经野等纂修：民国《曲阜县志》卷4《政教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9号，第381页。

⑦ 朱汉民：《中国书院制度的反思》，王立斌主编：《书院纵横》第1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页。

⑧ 彭璠：《尼山书院记》，陈镐：《阙里志》卷9《历代碑记》，第635页。

⑨ 李经野等纂修：民国《曲阜县志》卷4《政教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9号，第378页。

隆二年改正八品……顺治九年覆准由衍圣公咨送弟侄题补。”^①洙泗书院同尼山书院大致类似，只是题补者可扩至孔氏生员。明正德二年以衍圣公次子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主中庸书院祀事。所谓“旧有孔氏恩官名目，恩官二字既不典，且考其人即各山长、学录也”^②，足见其书院主持者位列朝廷品官。故“孔府档案”中保留了大量有关学录题补的文件，“清代‘题补洙泗书院学录’就有二十八卷七八百件，‘题补尼山书院学录’就有三十七卷近千件”^③。比隆国学、秩视国子监、官列世职，其他地区的书院对此望尘莫及。

由明至清，书院的官学化趋势日益明显，私立书院倡导自由论辩，容易对封建统治造成冲击，明万历年间张居正曾议毁天下书院，“（清朝统治者）改变对书院的政策，由消极的抑制，改为积极兴办和加强控制并重”^④。邹鲁地区多数书院明显带有官方色彩，从创建到管理、从主持者身份到行事模式，都呈现出偏官属的组织形式。

（四）“中正保守”的教化理念。书院在古代学术史上最耀眼的异彩在于其能够进行自由学术辩论，敢于打破僵化教条，提出一些不同于朝廷意志的主张。这在明清时期加强专制、禁锢思想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弥足珍贵，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东林书院便是其中典型，而匍匐于圣府之下的邹鲁地区书院很难呈现自主性。首先，书院山长是正统的圣人后裔，一方面接受着朝廷的官俸优待，依附并受制于专制皇权，是封建统治的文化代言人，不敢也不愿对朝廷意志提出质疑；一方面着意于尊奉先祖、维护先圣权威，绝不允许随便品评先贤和议论经典，所以保守性极强。山长的保守性导致邹鲁地区书院在自主性表现上十分低沉，尤其是相较于南方那些理学大家创办的具有高度学术自由的书院。

其次，从教授内容和施教理念看，邹鲁地区书院以儒家经典至上，排斥驳杂末流。《中庸书院开堂训辞》云：“窃闻古之学者，始学为君子，终学为圣人……今吾侪生于我邹鲁，长于我邹鲁，其学又当何如哉？……幸望遵循朱文公读书之序，先《大学》，次《论语》《孟子》，次《中庸》……其或舍此不务，而屑然点墨濡毫，摘章绘句，骈花骊草，嘲风咏月。文不载道，既不可以经天纬地；《诗》亡风雅，又不以扶衰救弊。抑不知雕虫篆刻，连编累牍，竟何补于世哉！”^⑤其中尤其推崇“四书”，对经典以外的内容加以排斥，故子思书院所藏书籍多《孝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周易注疏》等经部文献，且认为“九经载天地之心，圣贤明是心以相传……学者舍是而他求焉，则奚异耳目自涂……居广居、行大道，天爵修、人爵至，未有不由九经而致者也”^⑥。从书院记等材料中可以窥探到邹鲁地区书院的施教理念。《中庸精舍记》载：“子思之诚之，孟子之思诚，三纲五常之道胥此焉出，岂释老空谈比邪？”^⑦其中明显排斥佛道两家，可同石门书院初建时“外迁释老，独奉孔子”的情况相合。《尼山书院碑铭》：“罗阔公曰：‘惟天生圣，惟皇崇圣，孰敢不钦？若官若吏若士，敢有不祇厥事，国则有常刑；敢有朋酗酒、致郑声、博弈、突疇以黷清庙，时则有大罚……’赵公曰：‘惟天生圣，惟圣垂宪，惟贤典教，惟士祇学，报本于兹，有翼有严，若师若士，非

① 乾隆《曲阜县志》卷40《职官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73册，第286页。

② 乾隆《曲阜县志》卷40《职官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73册，第290页。

③ 骆承烈、梁方建：《孔府书院及其特点》，《南昌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④ 安作璋、王志民主编：《齐鲁文化通史》第7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359页。

⑤ 刘培桂：《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齐鲁书社，2005年，第40页。

⑥ 刘秦：《中庸精舍书籍之记》，陈镐：《阙里志》卷10《国朝碑记》，第668页。

⑦ 《孔颜孟三氏志》卷6《亚圣孟氏志事类》，“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传记类，第14册，第311页。

经何教，非德何学。’”^①其中有着严格的纪律与处罚规定，唯一目的即在于讲经学经、灌输儒家正统思想。

邹鲁地区书院还以正统自居，批评其他地区的书院。“近代立四大书院，如白鹿、岳麓、睢阳、石鼓者，本欲讲明道义，使之通诸心、有诸身。迨其末流，皆徇乎俗学，以发荣决科为业，殆失立书院之始计。”^②以夫子之道自膺，故有权指斥其他书院及学说的不经不当之处。如“斯其代，不尽讲而见用者，则为萧、曹、房、杜；不见用而能讲者，则为董、王、程、朱；且讲且用而行其私者，则为禹、雄、林甫、安石。曰：嗟呼！是谓讲者未必用；用者未必讲；且讲且用者，未必于夫子之道益也”^③。足见在明清文化专制的环境下，邹鲁之地的书院更加自觉地表现出对儒学正统的高度遵从、继承和维护，以保障其礼仪之乡、文教圣地的声誉。但囿于传统则限制了自身的视野和进步，导致理性思维和批判意识的缺失，表现为极强的保守性。动辄标榜儒家道统，如“敦本抑末”“取诸纯正”一类论说在其地书院记中屡见不鲜，呈现出中正保守的教化理念。

邹鲁地区书院的思想活跃程度远不如南方地区，尤其是没能孕育出影响较大的理学名家，其中既有地域文化因素，也有一定历史原因。南宋时期邹鲁地区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而此时恰逢理学发展高潮，于是邹鲁地区在儒学发展进程中错过了一个重要机遇期。书院的自主性正是由倡导自由论辩的理学大家所引导确立，这是邹鲁地区书院所不具备的。

此外，根据地方志等相关资料，还可以看出邹鲁地区多数书院有着相对雄厚的学田实力。尼山、洙泗、春秋、石门等书院的开支用度有专门的祭田或学田供给，有的甚至以其地集税充用。子思书院等，或钦赐官拨，或绅民捐助，都有一定膏火资产。至于贡举情况，因邹鲁地区书院在明清时期并不把教学活动当作重点，而以科举为务的四氏学、县学等学宫有着固定的岁贡名额，相比之下书院学子的科举入仕情况则乏善可陈。

三 明清邹鲁地区书院发展特质成因分析

通过对明清时期邹鲁地区书院发展特征的考察，可以看到其与众不同的面貌，而造成这种面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先圣发迹之域自然广布圣迹，循圣迹建设书院在自然情理之中，因圣而设自然又特别重视祭祀，立足于绝对崇奉孔子儒学只能保持中正保守，这一系列特质有着环环紧系、丝丝入扣的逻辑理路。除此之外，从政治保护力量、地域人文环境和同质设施生态三个角度入手，也可对上述书院发展特质的成因进行深入分析。

（一）朝廷优渥，圣裔荫庇。“尊儒重道”是明清统治者为了巩固王朝统治而实行的重大文化战略，在此背景下，邹鲁地区的文教事业尤为引人注目，自朝廷以降的各级官府无不百般推助。无论是皇帝亲临祭拜，还是省府州县各级官衙的政策倾斜，都体现出其得天独厚的地位和优势。如此，邹鲁书院的创建可依圣迹，其发展壮大也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尽管朝廷直接赞助邹鲁地区书院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其却受到具有官衙性质的圣府的直接庇护。

通过考察“孔府档案”中有关书院情况的记载，可以看出圣公府对书院的掌控主要表现在学录或山长的任免、学田或祭田的租佃和每年例行的几次祭祀活动。如上文所述，尼山书

① 陈绎曾：《尼山书院碑铭》，陈镐：《阙里志》卷9《历代碑记》，第633页。

② 潘迪：《子思书院新庙之记》，孟广均、陈锦、孙葆田：《重纂三迁志》卷7《碑记》，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年，第451页。

③ 吕柟：《重修洙泗讲坛记》，杨朝明主编：《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第4辑，第117页。

院、洙泗书院的学录是由圣府保荐、由朝廷认定、以孔氏担任；春秋书院和石门书院的春秋祭祀由圣府委派奉祀官；子思书院由孔府管辖；三迁书院由孟府管辖，其余几所书院也多由本邑官府干预。而且，“有的学录实际上充当了为孔府服务的官员。如乾隆年间，尼山学录孔传沂曾帮助孔府侵吞别人的田地；四品执事官世袭洙泗书院学录孔毓升于嘉靖十一年（1532）、十二年替孔府到泗水魏庄收租，被农民围了起来；世袭尼山书院学录孔宪璧于咸丰十一年（1861）为保护尼山孔庙向孔府主人呼吁等。”^① 足见书院为圣府服务而圣府负责保护书院的荫庇授受关系。“朝廷优渥，圣裔荫庇”直接导致邹鲁地区书院偏官属的组织形式，进而形成中正保守的教化理念。

（二）人文纯粹，民风重礼。书院教育作为区域文化的组成部分，推动着区域文化的繁荣，同时其发展走向亦受到当地人文环境、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等因素的综合施力。从人文环境角度看，邹鲁地区是原生态、纯生态的儒家文化场域，人文环境纯粹、文化生态稳固。以宗教生态为例，相比于兖州府治、济宁州区、滋阳、汶上、嘉祥等地，邹鲁地区在明清时期的佛道信仰以及伊斯兰教发展都相对低沉。根据乾隆《兖州府志》所录寺观志^②，曲阜、邹县在明清时期的佛寺和道观远不如其他县区发达，足见佛道生存空间和传播速率一定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消解。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的济宁东大寺和约创建于明末清初的济宁西大寺是济宁乃至山东地区影响甚大的伊斯兰教清真寺，西大寺还曾独创山东经学派，而邹鲁地区清真寺的发展一直受到圣府压抑。根据孔府档案，曲阜清真寺始建时就先后多次受到圣公府抵制，建成后的宗教活动也一直不甚高涨，类似情况亦见于清季以来基督教在邹鲁地区的传播发展。可以看出，邹鲁地区的文教空间、信仰空间都以单一的正统儒学为尊，这无疑是书院中正特质形成的重要文化支撑。

邹鲁地区的习俗及生活空间亦复以儒家礼仪为重。一方面，明清时期邹鲁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工商业相对不足，农业生产造就了朴实的乡众，讲仪节、守规矩、重乡德、敦教化是当地代代相传的民风；另一方面，其地圣裔祭祀先祖先贤的礼仪活动深刻影响着当地民俗，孔府有《孔氏家仪》规定家族礼制活动，而乡民模仿因袭，在整个邹鲁地区呈现出一派家家重礼、人人循礼、以礼为本的社会氛围。《左传》记载，鲁昭公二年（前540）晋大夫韩宣子访鲁，曾发出“周礼尽在鲁矣”^③的感叹，这是因为鲁国作为周公封地有着特殊的礼仪资质，且自周初以降，其典籍保存和传承情况都比较乐观。民风重礼是邹鲁地区自先秦时期承续而来的地方文化基因，有着深刻的历史因素，而此民风显然有助于其地书院重礼特征的形成。总之，儒学化而非宗教化的精神状态、农业经济下安土重迁而非商业社会下活跃流动的生活状态、重礼崇义而非钻营取巧的民风，这些构成了邹鲁地区“人文纯粹，民风重礼”的人文环境。形而下的朴素交织着形而上的单纯，既造就了其地书院重礼、中正的特质，也是其地书院陷入保守而进步性不足的重要原因。

（三）其他文教设施的荫蔽。地处圣域固然为邹鲁地区书院的发展带来了先天优势，但圣地其他文教设施也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书院应有的光辉。“曲阜四氏学”教授孔、孟、颜、曾四氏弟子，邹鲁两县县学也大量收纳读书子弟，孔庙奎文阁则负责藏书，如此设置无形中挤压了书院教育功能的发展空间。

① 骆承烈、梁方建：《孔府书院及其特点》，《南昌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② 乾隆《兖州府志》卷20《寺观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71册，第400页。

③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1227页。

曲阜四氏学在孔府家学基础上发展而来，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颜、孟二氏子弟准入，发展为“三氏学”，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添入曾氏，四氏学最终定型。四氏学是封建王朝尊崇孔儒的产物，其学子仅限孔、颜、曾、孟四氏弟子，这反映出历代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和对圣贤后裔的优礼。^①《阙里文献考》在“学校”目下详细介绍了四氏学的沿革、学员及贡举名额、学录俸禄与学田等情况，如明万历四十年，“提学道陈瑛言于巡按曰：‘四氏学官有教授、学录，视国学则少杀，视郡学则较隆。其廩增额数，自当比视郡学。向因人才未盛，故旧额仅三十人。今后裔蕃衍，入学者已三百有余，而廩额如故，非所以重圣贤之裔也。应将四氏学廩生加十名，如府学数，增广生员亦如之，廩饩在学田内支领。儒童岁科两试，入学四十名，岁贡每年贡一人。’巡按据以上请，报可。”^②到清代时，四氏学更加受到朝廷优待，岁贡名额均有特加之数。“乾隆元年，恩科广额，于三名外得广一名。儒童入学之数，顺治初裁为十五名，寻又增五名，今定为二十名。”^③至于学田，明代其学田总数高达20顷，清时教授俸银及日常开支从曲阜县正项钱粮内支取。而邹鲁地区书院的山长、学录很多出自四氏学，创办三迁书院的孟广均便是一例，洙泗、尼山二书院中的这种情况更是不胜枚举。所以，同四氏学的学员质量、师资力量、经济实力、贡举恩例相比，书院都大为逊色。曲阜、邹城两县县学的实力同样不容小觑，毕竟它们才是正式列入官方教育体系的学校。以邹县县学为例，“岁科试各取进文童十五名，岁试取进武童十五名……遇有恩诏则以正贡作恩贡，次贡作正贡”^④，这也是邹鲁地区书院所不具备的选举资格。

孔庙奎文阁是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藏书楼，所藏书籍和刻板数量巨大，且不乏御制珍品。明清时期有多位皇帝钦赐奎文阁御制书籍，如今阁前廊下西端存有明正德十五年（1520）所立《奎文阁重置书籍记》碑刻一通，碑文记载了明正德六年刘六、刘七率农民起义军攻占曲阜、进驻孔庙，“秣马于庭，污书于池”，将奎文阁藏书“焚毁殆尽”。之后皇帝“又命礼部颁御书以赐”，以致“阁中之书，天下莫备焉……命礼部颁御书以赐，崇儒重道可谓至矣。止于‘五经’‘四书’《性理大全》《通鉴纲目》者，取诸言之正且纯者，其他不以典也”^⑤。明清时期增设奎文阁七品典籍官一员，专门管理书籍典章。与之相较，教学性本就不强的书院的藏书必要性进一步被压缩。

同时，邹鲁地区书院的祭祀功能虽然胜于其他地区的一般书院，但在本地先圣林庙丛立的情况下也并非至关重要。邹鲁地区有周公庙、孔庙、孔林、梁公林、颜庙、东西颜林、子思子祠、孟庙、孟林等，这些设施的功能全在于供奉、祭祀先圣，大小祭祀仪式时常举行。以孔庙为例，从西汉高祖到清高宗1700余年间，先后有12位皇帝亲诣曲阜阙里祭祀孔子，共计20次之多^⑥，遣官代祀致祭的情况更是数不胜数。孔庙日常祭祀，除每年四仲月释奠、四孟月时享和每月朔日释菜、望日行香外，更有每月荐新，“每年农历二月的花朝日、三月的寒食日、五月的端阳日、六月初伏日、八月中秋日、九月重阳日、十一月长至日、十二月

① 孙业旺、孟继新：《济宁书院与四氏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85页。

② 孔继汾著，周海生点校：《阙里文献考》卷27《学校》，第214页。

③ 孔继汾著，周海生点校：《阙里文献考》卷27《学校》，第215页。

④ 光绪《邹县续志》卷4《学校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0号，第106页。

⑤ 熊相尚：《奎文阁重置书籍记》，陈镐：《阙里志》卷10《国朝碑记》，第675页。

⑥ 参见孔德平、彭庆涛：《游读曲阜》，泰山出版社，2012年，第506页。

腊日举行，由衍圣公率领族人荐新于庙寝。”^①与之相比，书院祀典只能作为林庙祭祀的“分场”“分献”，规模、影响均远远不及。明白以上几点，便可理解邹鲁地区书院发展特质的形成原因。

结 语

光绪帝在戊戌变法中采纳康有为奏议，诏令全国书院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大中小学校。光绪二十八年（1902），曲阜昌平书院被改设为曲阜官立中学堂，到1905年又兼设高等小学堂，民国3年（1914）以后，一直为书院小学。^②民国18年，以石门书院集捐收入在其地设立明德小学，在春秋书院祭费之余也附设明德小学。2008年，在尼山东麓新建的圣源书院，以“弘道明德、博学笃行”为院训，仿照古代书院建立了“民办公助，书院所有，独立运作，世代传承”的体制，并组织讲师在附近乡村开设“儒学讲堂”，起到教化乡里的作用。2017年，洙泗书院文化复兴工作筹委会成立，制定《洙泗共识》以阐明书院宗旨，即“以儒家义理建设社会之学术研究，养成有志于社会建设之士君子”。在孔子诞生地尼山，除尼山书院外，新建尼山圣境涵括大学堂、大会堂等设施，作为尼山世界儒学中心驻地，开展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世界儒学大会等学术活动。这些不可不谓是存续斯文的文化壮举，延续起邹鲁地区古代书院的文化命脉。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程中，邹鲁地区日益受到国人注目，被世人誉为“东方圣城”“首善之区”。邹鲁地区既是孔孟儒学诞生地，也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如今又被列为“国家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在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中占据重要地域坐标，对其地明清时期的书院进行研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探究书院发展特质有利于认清其地文化风貌，分析特质成因有利于明晰其时教育发展的内在理路。通过梳理邹鲁地区方志等资料，可以发现其地书院在明清时期呈现出“重圣迹”的分布格局、“重祭祀”的功能重心、“偏官属”的组织形式、“中正保守”的教化理念四大发展特质。而成因在于此地作为孔孟故里，圣迹广布、朝廷优渥、圣裔荫庇，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人文纯粹、民风重礼的文化环境，同时四氏学、奎文阁等文教设施的兴盛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书院原本作为教育机构的发展空间。

优入圣域，斯文在兹。明清时期邹鲁地区书院的发展为理解古代书院教育状况提供了新的认知面向，通过剖析书院发展特质及成因可以促使我们真切感知历史文化、更好处理当前传统文化教育中遇到的问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镜鉴。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彭庆涛、孟继新、刘岩：《中国古代国家祭祀》，泰山出版社，2016年，第94页。

② 参见曲阜教育志编写组主编：《曲阜教育志》，曲阜市印刷厂，1987年，第51页。